

经济史上的 结构和变革

[美] 道格拉斯·C. 诺思 著

务 印 书 馆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美〕道格拉斯·C. 诺思 著

厉以平 译

0024436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图书馆藏书章

总号 408827

书号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1
本书根据美国诺顿公司 1981 年版译出

内部发行
JINGJISHI SHANG DE JIEGOU HE BIANGÉ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美〕道格拉斯·C. 诺思 著
厉以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999-5/F·101

1992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68 千
印数 0—2 700 册	印张 7 1/4

定价: 3.30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译者序言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于1981年出版，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诺思曾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西方经济学会会长、华盛顿大学经济系主任，现任该校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诺思在学术上的贡献和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一) 他为1790—1860年美国经济发展设计出一种可称作“一国三方”的经济模式。他在1961年发表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观点。诺思认为，在1815年刚刚起步的美国经济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三部分独立的经济组成，即“北部”，从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沿岸到宾夕法尼亚和北达拉华；“南部”，包括使用黑奴的各州；横贯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西部”。19世纪初，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逐渐将这三部分联成一片，但各地仍保留各自的相对经济优势。北部为南部和西部提供服装、鞋靴和工业制品；南部为北部提供棉花原料；西部为北部和南部提供粮食和农产品，为北部提供皮革。美国经济模式如同一个三足鼎，每个地区都依赖另外两个地区，三部分共同支撑着美国的经济。诺思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资源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被认为第一次圆满地解释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并且为从经济上解释日益加剧以至最终引发内战的地区矛盾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目前这个观点已成为大多数教科书所采用的标准体系。

(二) 诺思是六十年代支持创立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人物。他于1966年出版的《美国历史上的发展和福利：新经济史》使他成

为美国经济史新的研究方法的主要实践者。据另一位著名的新经济史学家休斯所说，“新经济史”一词就是诺思首创的。诺思和其他提倡这种研究方法的学者反对为叙述历史而叙述，建议经济史学家应用当代经济理论的观点和方法提出假设，验证和利用档案资料。他们主张任何假设都应当通过收集有关数量资料并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所进行的分析来严格检验。诺思在阐明和传播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起了主要作用。1960—1968年间他是这门新学科的领袖，1960—1966年他参与主编了《经济史杂志》，使这本最有声望的经济史刊物为自觉应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或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文章敞开了方便之门。在这个时期，诺思发表的论文有《美国经济史的定量研究》(1963年)、《经济史现状》(1965年)和《经济史》(1968年)。他于1966年出版的《美国历史上的发展和福利：新经济史》向人们显示了新经济史的威力。在这本论文集中，诺思应用经济理论和表格式的数量资料向当时流行的观点提出挑战，他证明可以利用最基本的经济理论对一些历史解释提出质疑。由于该书是第一本、在许多年内也是唯一的一本适用于大学本科的新经济史教材，因此，在一个时期该书一直拥有许多读者。至于他在该书中提出的一系列创见则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争论，从而扩大了新经济史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对按照新方法培养出来的经济史学家的需求剧增，于是诺思所执教的华盛顿大学和格申克龙所执教的哈佛大学等机构成为新经济史学者的培训中心。在不长的时间里，一大批第二代新经济史学家脱颖而出，在全国大学经济系里担任了职务，并在这一学科里占据了支配地位。

(三) 诺思及其合作者设计出一个有关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的经济模式，从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其它组织结构的变革与创新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诺思在学术上的开拓进取是孜孜不倦的。他并不满意新经济史学依附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状况。1973年,诺思在就任经济史学会会长时所作的题为“超越新经济史”的演说中指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史学家来说有两大缺陷,一是它的目的不在于解释长期的经济变化,另一是即使它试图解释这个问题,它提供的答案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为了弥补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不足,诺思及其合作者努力创建适合于研究课题和特定时期具体情况的模式。1971年,他与戴维斯合作出版了《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1973年,他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1981年诺思又单独出版了《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如果说前两部著作还属于个案分析,在理论上还没有系统的建树,实际考察也仅限于美国二百年的经济增长及西欧封建主义的兴衰和英、法、荷兰、西班牙四国的不同历程,那么,诺思在八十年代出版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则相当完整地提出了一套经济史理论,并且用这套理论考察和解释了自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诺思从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假定出发,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构建了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诺思在本书中集中表述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由于人类受其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只有通过交换即交易这一基本活动获得经济效益和安全保障,而所有权是交易的基本先决条件,所有权结构的效率引起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国家则规定着所有权的结构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此外,由于约束行为的衡量费用很高,如果没有思想信念约束个人最大限度追逐利益,会使经济组织的活力受到威胁。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种节省时间精力的工具,有助于实现决策过程简化并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制度富有粘合力。诺

思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来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人类社会的演进,显然是富有启示意义的。早在七十年代,当《西方世界的兴起》等著作出版后,在新经济史学研究领域便不断有追随者竞相仿效,运用类似的方法研究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过程,提出种种重新解释西方各国历史的观点。《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将新经济史学更加理论化和体系化,考察的时空跨度也更大。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赢得了更广泛的推崇和赞誉。我们将本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展,广大读者会对此书的价值作出应有的评价。

目 录

序言	1
----------	---

第一编 理论

第一章 问题	5
第二章 经济结构导论	14
第三章 新古典派的国家理论	21
第四章 一个分析历史上经济组织的框架	34
第五章 意识形态和白搭车问题	46
第六章 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	60

第二编 历史

第七章 第一次经济革命	72
第八章 第一次经济革命的组织后果	89
第九章 古代社会的经济变革和衰落	111
第十章 封建制度的兴衰	122
第十一章 近代欧洲的结构和变革	141
第十二章 工业革命的反思	156
第十三章 第二次经济革命及其后果	168
第十四章 1789—1914年美国经济的结构和变革	183

第三编 理论和历史

第十五章 制度变革理论和西方世界经济史	195
参考书目	204

序 言

本书旨在为分析经济史提供一个新的框架。其所以需要新的框架,是因为经济史学家们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已不能解决经济史上那些主要的问题:即如何说明作为经济系统成就的基础的制度结构和获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以及如何说明此种结构的变革。制度变革理论的发展,是对社会科学家的一项重大挑战。本书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某些——当然不是全部——要素。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都把他们的模型建立在收益来自贸易的坚实基础之上。专业化和分工是《国富论》的关键。不过,经济学家在构建他们的模型时,对于这种专业化和分工所需要的成本一直忽略不计。这些交易成本支撑着决定政治—经济体制结构的那些制度。因而,本书的理论框架便与其它社会科学有一部分相重叠,并把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看作是解释制度变革的基本成份。相应地,本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更为广泛而不仅限于经济史学家。心存此念,我力图尽量不用技术性的经济学语言。虽然在第一章我用正式的经济学术语提出了问题,但在本书的其它各章节,我都尽量使论点能够为非经济学者一目了然。

第一编的理论,提出把大部分经济史重新铸成新的模型;第二编,对西方经济史从农业起源到二十世纪这一万年作了适当处理。对经济史之所以要进行如此广泛的考察,理由在于,解释经济史上的进展,需要有一种概念基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并不比我们所用的理论更好,不幸得很,理论一直是有缺陷的。本书中的理论和据此而写成的历史论文,为系统考察和验证新假设提供一个基础,

这些新假设将引起对新证据的研究,而后对假设进行修改或反驳。

为了对知识有所贡献,理论就其潜意义应当是可驳的:既可直接根据研究所含的假定进行检验,也可间接根据逻辑引出的假定(从论据得出)加以检验。在不可能对经济史的解释作出最后验证的情况下,可以料想,不同部门所坚持利用的解释也是对立的,因而现今的政策法令才彼此冲突。不过,我提出一个现实的、而不是令人沮丧的忠告:如果我们相信对历史可以作出唯一科学的解释,那么我们不过是在欺骗自己;但如果我们不试图去达到那个目标,那么便是低估了经济史这门学科。持续研究可验证的假定和不断累积证据,可以使对立的解释数目减少。我们不可能在一切争论问题上都达成一致,但我们希望,在这些或那些问题上,我们能将可供选择的解释加以缩减。

本书是对与兰斯·戴维斯合作在《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成长》(1971年)和与罗伯特·托马斯合作在《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1973年)里开始的关于制度变革的研究的继续。我非常感谢在以前的研究中与我合作的这两位作者。此外,对于给予我目前这项研究以很大帮助的许多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它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也至为感谢。我对四位背景不同的读者,抱有特殊的感激之情,是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整部手稿给予了详细的评论。他们是乔治·本特森、斯坦利·恩格尔曼、玛格丽特·利瓦伊和曼库尔·奥尔森。此外,我对交易成本和经济组织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的同事史蒂文·切昂。

华盛顿大学的其它同事中,对我的部分研究提供了有益批评的,有约拉姆·巴泽尔、阿瑟·费里尔、迈克尔·赫克特尔、保罗·海涅、罗伯特·希格斯、莱维斯·科钦、卡罗尔·托马斯和迪安·沃斯特。

这部手稿的各部分曾在一些大学和几次会议上试用过,一些

章节曾征求过这些大学的同事的批评意见。给我提供了特别有益的批评的,有:摩西·阿布拉莫维茨、阿曼·阿尔切安、雷·巴塔利奥、理查德·比恩、卡尔·达尔曼、维克多·戈德堡、乔纳森·休斯、查尔斯·普洛特、加斯頓·里姆林格尔、汤姆·萨文、西奥多·舒尔茨、弗农·史密斯、戈登·塔洛克、伯顿·韦斯布罗德和奥利弗·威廉森。此外,我还要感谢在那些讨论会上帮助改进这项研究的许多同仁。

伊丽莎白·凯斯编辑了全部手稿。在这一过程中,她促使我去澄清我自己在每一页上的思想。

密执安州, 贝城

1980年8月

第一编

理论

第一章 问题

我把经济史的任务理解成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所谓“绩效”，我指的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有代表性的事物，如生产多少、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或生产的稳定性。在解释绩效时，最初强调的是总产量、人均产量和社会收入分配。所谓“结构”，我指的是被我们认为是基本上决定绩效的一个社会的那些特点。这里，我把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制度、技术、人口统计学和意识形态都包括在内。“整个时期”表示经济史应能解释结构和绩效的短暂变化。最后，“解释”是指明晰的推理和潜在的可驳性。

这项研究致力于经济史的两个主要的然而却被忽视的任务：一是将经济的结构理论化，另一是既说明这些结构的稳定性，又说明它们的变化。我将运用一个简单的新古典模型集中去考察绩效的总产量和人均产量方面。不过，为了解释收入分配和一个经济的结构，我们还必须把理论延伸到传统的新古典领域以外。

我们先来描述一下新古典派用以分析经济绩效的方法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这一方法假定面临普遍匮乏，个人作出的选择反映了一组欲望、需要或偏好。这些选择是根据放弃的机会做出的。因而多工作一小时的机会成本(和所得到的增加的收入)等于放弃的

闲暇。这一效用,即福利最大化,要求假定个人对收入、闲暇等有一组固定的偏好,因而边际选择(即当个人决定多工作一小时时所作的选择)是指在得到(更多收入)还是应当放弃(闲暇)之间所作的权衡。^①这一行为假定在各种经济制度(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起作用。

既然最大化假定宣称个人宁可选择较多的而不是较少的商品(和劳务),既然提高生产潜力(要牺牲为现期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可以生产较多的商品,因而整个社会,人人都将为增加资本存量贡献他们的部分成果——因为资本存量的大小决定着构成一种系统产生的商品和劳务的流量。资本存量的规模由人力资本(劳动)、实物资本(机器、工厂、农业改良等)和自然资源的数量构成。这些又取决于可以利用的技术(即人对自然的支配),换言之,可用的技术决定着劳动体现的技艺(人力资本)、实物资本的质量和自然资源的构成。技术变革被认为是内生的,并被看作是社会成员投资于发明和创新的结果。不过,“发明的潜力”又取决于知识的存量(对自然环境的认识)。

因而,决定产量的资本存量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知识的函数。最大化假定将导致对具有最高收益率的那部分资本存量进行投资,那部分存量相对于其它存量在数量上将会增长,从而保证使收益率逐渐拉平。而后,新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将会创造出来,而新的自然资源则会被发现,此时,将放弃的消费(即储蓄)投资于发明或发现那些特别的技术和自然资源而得到的收益率超过了现有各种机器和技艺的扩张而得到的收益率。如果劳动力规模相对于资本存量增长,那么,调整人力和实物资本的

^① 参见贝克尔的导言(1976年)对新古典派假定的一个传统论述。弗洛伊德(1969年)关于新古典派方法运用于经济成长的出色阐述使我受益不浅。

形式以适应资本劳动力比率的变动,将是有利可图的。同样,也可以对自然资源存量进行某些调节。

在这些情况下,总产量的增长和人均产量的增长,是由已储蓄的(和已投资的)收入部分和人口增长率所决定的。如果已储蓄的收入部分导致的产量增长正好等于人口的增长,那么,人均收入增长为零。另一方面,如果储蓄率高于人口增长,那么,将导致实际人均收入率增长。

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看,新古典派的这一公式似乎是用未证实的假定来解释一切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它所涉及的社会是一个无摩擦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制度不存在,一切变化都通过完善运转的市场发生。总之,获得信息的成本、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都不存在。但是,恰恰因为这种不存在,新古典派公式才提出那些有待探讨的基本假定,以便发展一种关于结构和变革的有用理论。

首先,模型假定一种刺激结构将使个人按全部差额得到投资的社会收益,就是说,使个人和社会的收益相等。其次,它假定,新知识的获得和利用的收益不递减,因为在成本固定下能够增加自然资源的存量。第三,它假定,储蓄有实际收益。第四,假定生育后代的个人和社会费用是相等的。最后,人们的选择和预期的结果是一致的。让我们对每一点依次进行考察。

规定完善和无需成本实施的所有权(即零交易成本)是坚持第一个假定所必需的。这样的条件从来没有具备过。而当今象整个历史一样,许多资源更接近于公有财产而不是专有财产。因此,达到同等边际效率解决所必需的条件,无论是罗马共和国,还是二十世纪的美国或苏联,从来就不曾有过。在已经历过的那些社会中,最好的不过是把个人收益提高到与社会收益相当接近的程度,以便提供足够的刺激来达到经济增长。然而,增长与停滞或衰退相比要少见得多。这一事实表明,“有效率的”所有权在历史上并不常

见。特别是个人向来不具备从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加中获得社会收益的能力,或者说,这种能力很不完善。因此,不仅技术进步在整个历史的大部分阶段是缓慢的,而且,自然资源存量的收益递减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经济难题。

那个难题使我们得出模型的第二个假定:科学和技术仅仅在现代才合而为一,真正克服了收益递减。虽然西方国家在上个世纪不曾经历过自然资源收益递减,但它们必定在更久远的往昔经历过。

储蓄的实际收益的存在,也取决于所有权结构。在整个历史上,已储蓄的收入的比例和资本构成的比率(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通常是极低的,有时为零或负数。对所有权的担保是储蓄和资本构成比率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生育后代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一致,不仅意味着人口出生率受人的控制,而且意味已有的刺激和抑制结构随时调整个人的生育决策,以适应于人口增加所需社会成本的变化。马尔萨斯危机在整个历史上反复出现就充分证明这一条件尚未具备。

最后,我们要提一下最后一个假定:选择与结果的一致。新古典理论与经济史的基本含义有关的一个颇有影响的见解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人利润即福利的最大化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没有人能肯定一项决策的后果),不过,福利最大化的结果仍然存在。它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普遍不足的情况下,竞争决定着比较有效率的制度、政策或个人行为会存在,而无效率的制度、政策或个人行为则归于消灭。^①这一见解是理解经济组织的制度形式演变

^① 参见A.阿尔切安(1950年)关于这一论点的经典论述。这整个研究所用的“有效率”和“无效率”术语,都是为了比较两组约束的含义——在一组里,参加者的最大化行为带来产量增长;而在另一组里,则不带来产量增长。

的基础,但在一个非市场社会,政治结构低效率的决策方式的确持续了很长时间。另外,个人、团体和阶级对现实的看法各不相同,解释它们周围社会的理论各不相同,推行的政策也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冲突。导致无效后果的“谬误的”理论,将促使奉行这种理论的那个团体让位于奉行后果有效的理论的另一个团体。但坚持低效率的政治经济结构反过来又使对立的意识形态成为理解经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生物学家对人类社会生存特征的洞察是一项重要贡献,但他们必须与确凿的事实相结合,这一事实就是,至少在对历史学家说来是决定性的、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人类文化产生过种种相反的、冲突的和无效的解决方案。

揭示新古典模型的这些假定,便于指出我将在本书中所选择的方向。解释历史上的经济绩效需要有一个人口统计变动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和制度理论,以便弥补上述新古典模型的缺陷。针对第一种需要,我直接利用了关于人口统计变化的文献。至于知识存量的变动,则与体现在制度中的激励结构变革一道加以考察。研究最初集中于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主要部分为:

- (1) 所有权理论,描述个人和团体的激励制度;
- (2) 国家理论,因为是国家规定着和实施着所有权;
- (3) 意识形态理论,解释各种不同的关于现实的观念如何影响个人对变革“客观”环境的反应。

在以下四章,我将发展经济制度结构理论的各个要点,但我首先要将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另一个基本问题作一番叙述:这就是历史上的变革问题(或其反面:经济制度的稳定性)。

让我们回到上述新古典模型上来。在该模型中,除市场外没有组织或制度,而且在这一框架中,变革是通过非个人市场上相对价格的变动而发生的。这种框架提供一套有力的工具,不仅解释自行调节的市场,而且表明怎样随着参数的改变来调整市场。由

于该模型是新古典经济学运用于历史的最有力的分析工具之一，因此，值得对这一点详加阐述。

为简明起见，让我们来描述在一个政治经济单位里发生的变化。这个单位土地固定，没有外部贸易(或生产要素的流动)，经历了人口增长。直接后果是食品(和原料)价格上升，因为短期供给曲线完全没有弹性。就是说，粮食销售者发现，按原有的价格会有更多的人需要他的食物，于是，他会把食物用光以便提高价格。一个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因为他的工资买到的食物减少了；地主的实际收入增加了，因为他出售的产品，虽然数量相同但得到的收入却多了。由于拥有土地可能盈利的能力提高，土地的价格被哄抬上去。投资者将提高资本对土地的比率，因为运用资本越多(改变排水系统、增加灌溉等)，从一定数量的土地上得到的产量越多，结果便越有利可图。确切的替代数依生产函数(即技术状况)而定。经过这一过程，即便在很短的时间里，粮食的供给曲线也会变得较有弹性。不过，调整过程远未结束。工人养育子女的费用提高了，结果，为了不致使其生活标准下降，工人家庭决定减少子女。发明食物生产的新技术(开发肥料或种子，培育高产作物、多产动物)以改变生产函数将提高盈利能力。于是，从长远看，人口增长率降低、食物供给增长(即长期供给曲线可能完全有弹性)。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土地价格降回到最初的均衡状态。

读者很快可以看出，这个新古典模型假定个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是一致的(即规定完善和无需费用实施的所有权)。按照相对价格变动提供的“信号”改变差额以完成调整过程，乃是模型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对价格的变动使生产要素无摩擦地转向它们最有盈利的用途，并且所有的变化都是最大化个人对成本收益变化的迅速反应。

现在让我们仔细考察同一个方案，不过，这次是在一个存在制

度和实际交易费用的现实社会。需求开始改变加上农产品供给曲线无弹性，固然导致市场价格上升，但调整过程是由信息成本所决定的。市场越是“不兴旺”，信息传播的技术便越是原始，调整过程发生所需的时间便越长。此外，在一个时期里，享有通常生活标准的工人(特别是城市工人)可能闹事以抗议食物成本上涨，或者呼吁政府限价以阻止涨价。土地的潜在价值将会上升，但如果有习惯的土地协议(或关于土地转让的禁令)，调整的性质便成为不确定的了。在对土地没有独占的所有权的情况下，农民可能得不到对土地资本密集利用的增益。农民会请求国家改变所有权，以便他们能得到土地所有权的独占收益，但如果把以前使用土地的人排除在外，他们将会反对所有权的这种变革。虽然生育子女的社会成本会上升，但可以察觉出的个人成本并不怎么大(因为增加一个劳动力除家庭成本外，还有社会成本，因而使工资率降低，而单个人增加则会变得更加拥挤，并可能使疾病传播)。结果与社会最适条件相比可能是一种延迟的反应。投资新知识和开发新技术的盈利能力，需要有某种程度的对思想和创新的所有权。在缺乏这种所有权的情况下，新技术便不可能来临。

这一方案决没有排除人口增长的可能后果，但它确实针对本书的两个基本问题。

1. 重要的是说明经济制度结构，以便有意义地探讨一种经济绩效的动力。

2. 虽然某些变化恰好以新古典经济学内含的方式(即个人成本收益的变化导致行为自动改变)在边际发生，而另一些变化则不是如此。特别是闹事和这种行为对生命安全带来的潜在威胁并不符合单个城市工人的利益。新古典主义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而会让别人去做。无论农民承担组织费用呼吁政府改变所有权——或者组织损失者同这种变化作斗争，都是不合算的。在每一

种情况下，白搭车难题都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让我们公正地对待白搭车问题吧。曼库尔·奥尔森(1965年)推广了新古典主义的范例，用来论述在新古典世界存在的团体行为方式。他发现小团体存在的地方，它们活动的个人收益超过成本，或者可以强迫个人行动，而在大团体(例如美国医学协会和工会)存在的地方，其成员可以得到局外人得不到的独占的个人收益。他还论证，当组织大团体发动变革而其成员并不享有某些独占的收益时，这些团体往往不稳定，而且是要消失的。总而言之，当个人收益靠白搭车而仍可以得到时，有理性的个人便不会承担参与大团体活动的费用。

奥尔森的著作给经济史提出一个基本的问题。日常随处而得的印象进一步证实，白搭车行为是普遍存在的。但随处可得的印象也证实，发生大团体活动并成为变革的一支基本力量的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只是这种活动不能用新古典派术语讲清楚罢了。用新古典派术语构筑其模型的经济史学家，已经将一个基本矛盾铸入其模型之中，因为新古典派模型没有办法说明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大量变革。

马克思主义靠证明阶级是结构变革的发动者便取巧地解决了整个问题，但那个论点则根本没有被说明，因为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考虑白搭车问题并使信念来了个大飞跃，认为人民为了阶级的利益会将他们自己的个人私利置诸不顾，甚至自愿承受重大的个人牺牲。然而，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本身提供了证明这不是标准行为的最好根据，正是他们把莫大精力贡献出来，试图使无产阶级确信能象一个阶级那样行动。

可以将说明变革的难题简述如下。新古典派经济理论可以说明人民为其自身利益行动的行为方式；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不为选举所惑；它也可以解释由于白搭车问题在个人利益受到忽视

的地方,人民之所以不参与团体活动的原因。但是,它不能有效地解释这个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为自身利益算计的行为并不是动因。我们究竟怎样说明利他行为(如隐姓埋名的无偿献血),怎样说明人民甘愿去从事要冒重大牺牲而无明显可能利益的事情(在历史上,会给个人或团体带来牢狱之灾和牺牲的没有休止的游行,难道是为了一些抽象的原因)?我们究竟怎样解释为数很多的人民去投票,或者在个人收益甚少或可忽略的地方,个人为参加自发性组织而作出大量的贡献?

新古典理论同样不足以解释稳定性。为什么人民在社会规章妨碍他们获得自己利益时竟对社会规章加以服从?当然,个人对成本收益的算计表明,欺诈、偷盗、逃避义务、行凶杀人可能是随处可见的。我们的确看到了这种种行为,但与它们并存的是,我们也看到,当他们侵犯重大利益而可以不受罚时,有些人却得服从规章。确实,新古典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社团能够生存。

在从事一项非法活动前,个人提出高于其机会成本的酬金是对他合法(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提出的价值的一种衡量。同样,个人在试图推行变革中承担的净成本,是对个人所感受的不公正和异化的衡量。为了说明变革和稳定,还需要有个人对成本收益算计以外的东西。人们在试图变革结构的过程中,可能会忽视这种算计,那是因为认为制度仍是不公正的那种思想信念太根深蒂固了。个人也可能服从习俗、规章和法律,那是因为认为它们是合法的信念根深蒂固的缘故。历史上的变革和稳定性,需要有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来解释同新古典理论关于个人主义合理算计相背离的那些情况。

第二章 经济结构导论

自从人类首次培育植物和驯养动物，从而加快了从野蛮到文明的漫长进化以来，在一万年间，已经有过一系列令人迷惑的经济组织，与其它非经济的制度相互影响着。我们能不能从这些事物中将决定经济绩效的基本结构提取出来？非经济制度与直接含有生产和交换关系的那些制度是怎样相互作用的，这一点很难确定。此外，这些制度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建立和破坏，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人民在历史上归结的机会和从价值准则中所引出的观念的结果。“现实”的内容与人民在历史上所归结出的关于其周围社会的理性化有关，而在基本方面，则受到他们关于现存习俗、规章和制度是正确或谬误的见解的影响。

我们可以从着眼于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紧张状况（这一点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经济史的中心）开始，利用保存着的资料来发展结构。自从托马斯·马尔萨斯于1798年写成他的第一篇关于人口的论文以来，学者们对他的关于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基础的悲观预见一直有争论。诚然，对马尔萨斯命题的社会含义的反应，导致了人口统计学与经济学的分离，这一分离直到近年来才重新弥合。

尽管现代就人口与资源之间的这种关系作了许多研究，但仍有许多方面是未知的，或被争论弄得很混乱。我们确实知道，尽管断断续续地有时在一个长时期中出现过人口的绝对下降，但纵观整个史前史和历史，人口是增长的。如果认为在更新世末期人口总计约800万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在前一、二百万年间，增长率也许每年为0.0007—0.0015%。农业出现后，增长率似乎加快了，

提高到0.036%，直到公元一世纪达到3亿。从一世纪到1750年，增长率一直为0.56%——结果人口增长到8亿。此后从1750—1800年，增长率急剧上升到0.44%；十九世纪上升到0.53%。二十世纪前五十年里为0.79%，而1950年以来为1.7%——从而使目前世界人口超过了40亿。^①

当我们试图把原因归之于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时便引起了争论。人口增长模式与马尔萨斯理论是一致的吗？埃斯特·博塞鲁普(1965年)将马尔萨斯的论点颠倒过来，证明人口增长刺激技术变革(从而刺激资源基础的增长)。还有一种观点，来自现代对原始部落的研究，这些部落似乎呈现出人口的自动平衡。在南非卡利哈里沙漠的丛林土著那里，事实表明，他们一天只用4或5个小时便可以得到他们的食物供给，为防止人口大量增长——从而为防止资源耗尽，活着的孩子隔得很开。^②我们可不可以认为史前部落具有同样的行为？在第十章里将考察这个问题。

经济史也涉及对资源变化的反馈效应。资源基础的缩减，肯定会通过饥馑和抗病力衰减而导致死亡率上升。需要多长时间降低人口出生率？它的社会机制是什么(与生理上的自动减少相对比)？延迟结婚、改进避孕方法、杀婴？随着资源基础扩大，人口如何反应？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现代人口的巨大增长，不是通过医学发现和免疫使死亡率下降的结果而是通过改善营养和环境使死亡率下降的结果。最后，我们如何解释在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出生率的下降？

由于许多这类问题没有解决，因此本书的研究不能不带有推测性。在生育孩子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似乎确有重大的不

① 参见安斯利·科尔(1974年，第42页)，也可参见卡洛·奇波拉(1962年)。

② 参见杜蒙德(1975年)关于这一证据的讨论。

同，生育孩子的个人成本的变化反应似乎更迟缓。新古典派对人口出生率的一项严格研究——即新家庭经济学——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工具；但它究竟能解释到什么程度，以及文化上即意识形态上的考虑能在多大程度上严格修正人口统计学的成本收益计算，仍然是众说不一的。^①看来，马尔萨斯人口压力也象一种历史的真实；此外，有时人口压力引起过技术的、社会的或其它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至少暂时）减轻了人口对资源基础的压力。^②另外，瘟疫在改变历史上的死亡率方面显然也起过重要作用，气候的变化也曾经改变过不同时期的资源基础（从而改变了死亡率）。^③

不过，虽然研究必然带有推测性，但本书的论点却是明确的。

1. 在人口与资源的比率方面，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中断，我称之为第一次和第二次经济革命。

2. 在这两次革命之间为马尔萨斯人口压力时期，这一压力有时被生理上和社会上的反应所抵消，有时则是被经济制度效率的改变（它改变了资源基础）所抵消。

让我们详细考察这后一方面的情况。资源的数量与技术状况有关。在前一章的简单的新古典模型里，我们可以让土地和自然资源不出现，采取假定它们在广义上可以被看作是资本存量的一部分。这不失为合理的现代假定，但却是对以往历史的解释的基本歪曲——因为只是到了上个世纪，随着第二次经济革命，自然资源报酬递减才不再是人口增长时老是存在的一种威胁或现

① 参见查尔斯·蒂利（1978年）关于历史上人口统计学状况的出色概述。

② 关于马尔萨斯人口压力的证据，参见阿纳利斯学派的大量研究，或罗纳德·李为这些问题所作的一个比较准确的模型：“适用于英国的前工业社会动力模型”，载蒂利编的《出生率变化的历史研究》（1978年）。博塞鲁普（1981年）就人口压力和技术变革之间的关系作过探讨。

③ 参见威廉·麦克尼尔（1976年）关于天灾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论述和勒鲁伊·拉杜里（1979年，第十七、十八章）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

实。不过,模型的确展示出一个基本点,那就是资源基础的扩大取决于技术的改进,从而最终取决于知识存量的增长。

人类的创造才能,使人有别于几百万年前的其它灵长类动物,就是一项对过去一万年技术史的有保留的研究,也使人们对人类的创造性惊讶不已。^①发明和创新似乎是人类所固有的癖好。发明活动不是这里的争论之点,这里争论的问题是,什么在决定着历史上发明活动的速度和方向。在这项对经济结构分析的初步探讨中,有三点需要指出。

1. 在整个历史上,在发明和创新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几乎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问题是,如何规定对思想的所有权和在经济活动中应用这种所有权;想出对技术发展的所有权比想出对产品或资源投入的所有权更为困难。由于对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程度难以计量,以及对这任何一种所有权难以实施,这两者一直是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有差距的基本原因。

2. 如内森·罗斯伯格(1976年)和保罗·戴维(1976年)所强调的,技术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列奥纳多·达芬奇在其出色的笔记中所提到的创新思想,如果没有工程、物理和化学的辅助性发展,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是由于有了光学上的辅助性发展(产生了显微镜),发现才有可能。因而,技术发展是建立在知识提前累积的基础上的,这决定着以后发明活动的方向。

3. 除非基础知识存量增长,否则,新技术发明最终将陷于收益递减。基础知识取决于物理学和其它科学的发展;决定这些学科发展的一些因素,直到相当晚近的时代才完全独立于新技术发展。不过,在科学和技术合而为一的第二次经济革命的近代社会,

^① 例如,要消除古代社会人类多么落后的观念,只需读一读亨利·霍奇斯的《古代社会技术》(1970年)一书,便会对古代社会非凡的技术发展留下深刻印象。

仍不妨把基础知识的增加看作是技术进步的派生需求。

知识存量和技术存量扩大人类福利的范围，但它们不决定人类在那些范围内怎样达到成功。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人类发展的各种合作和竞争的形式及实施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规章的那些制度，正是经济史的中心。这些规章不仅阐明了指导和决定经济活动的激励制度和抑制制度，而且决定着一个社会基本的福利和收入分配。理解结构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工具，那就是国家理论和所有权理论。

国家理论之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在于，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结构。国家最终对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而所有权结构的效率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因此，国家理论不仅要为产生低效率所有权的政治经济单位的固有的趋势提供解释，而且必须说明历史上国家的非稳定性。不幸的是，这一重要的理论工具并没有用在经济史上说明长期变革。

所有权理论对于说明人类为减少交易费用和组织交易而发明的各种经济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可以假定有一个“中性的”国家，那么，假定存在着对技术的压制、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在短缺和竞争的社会里出现的各种所有权，就其为一种最低成本方法这一意义而言，应当是有效的。事实上，出现所有权是国家统治者的期望与交易双方为减少交易费用所作的努力之间紧张状态不断加剧的后果。这一简单的两分法实际上却决不是简单的，因为交易双方要拿出资源影响政治决策者去改变规章。但至少作为推理的最初起点，将国家理论与研究所有权的交易成本方法加以区分是有用的。

政治和经济组织都具有一组共同的基本特点，这正是我们的研究中心。发明这两种组织，是为了利用专业化（包括暴力行为的比较利益）带来的交易收益而使资本财富最大化。这两种组织都

必需:

1. 用法规和章程来建立一组对行为的约束;
2. 设计出一套程序,以便对违反法规、章程进行检查和遵循法规、章程;
3. 辅之以一组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以减少实施费用。

法规、章程规定着本主(即政治组织的统治者和选民或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或者本主和代理人(在等级性政治经济组织中为统治者和官僚、所有者和经理、经理和工人)之间的交易条件。宪法、法律结构、所有权规定、组织细则、工会合同——凡此种种都体现着对行为的约束。

遵循措施涉及对违反法规、章程和已签订的合同协议的检查,对奖惩的规定和实施。如果可以不用费用来衡量交易商品和劳务的性能及代理人的成绩,那么,检查违章的问题便不重要了。衡量是对一种商品和劳务的正式描述,因而,如果没有某种衡量形式,所有权既不能建立,交换也不可能进行。遵循费用还包括对无绩效而施以处罚的费用。因为衡量是需付费的(而且,要衡量得精确,就必须付很高的费用),加之还有实施费用,因此,充分重视违背协议的行为对交易各方都有利。如果合同的任何一方不完成他或她承担的那部分合同,而可以不受损失地得到交易的收益,那么,这样做便是对他或她有利。逃税、诈骗、敷衍塞责、投机取巧、代理的问题(及用于监控和计量的资源),便因遵循措施费用昂贵而上升为主要问题。因此,无论是规章形式的行为约束,还是用来检查和强制遵循规章的那些措施,都是为使受到这些交易费用制约的本主的收益最大化而发明的。

有一部重要的文献论述在技术约束下最大化的组织含义,①

① 参见论生产职能的文献,或者说为了弄清历史的叙述,参见钱德勒(1977年)。

但是要发展一种关于政治经济制度的理论，则应当将那种约束与遵循成本带来的交易约束合并起来。在以下两章里，将对国家和经济组织约束最大化模型的要点加以展开。

不过，论据显然是不完善的。遵循需付代价，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对最大化行为的个人的约束，实施任何规章，都会使政治或经济制度没有可行性——因此，要进行巨大的投资，以使个人相信这些制度的合法性。一种政治和经济制度结构(和变革)的理论，必须与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后者是第五章的内容。

第三章 新古典派的国家理论^①

第一节

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况，使得有关国家的研究成为对于经济史是至为重要的：国家模式应当是任何有关长期变化分析的一个明确的组成部分。然而，尽管在漫长的历史探索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提出了各种关于国家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却向来不大注意这个问题。

不过，近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已证明是有力的分析工具——的最新进展已被应用于各种政治问题。^② 想来是一种选择理论的新古典理论至少提供了一种严格的、逻辑上一致的、有关国家研究的方法。这一理论提出了发展非市场决策的可驳性命题的希望。此外，对经济组织的研究，显示了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的密切关系。一种令人满意的企业理论，曾对国家理论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③

当然，我们应当注意到新古典派理论的局限。公共选择理论——应用于政治学的经济学——在解释政治决策方面其成功充其量是有限的。利益集团政治学不能有效地解释选举行为；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则似乎能说明大多数政治决策和司法决策。^④ 此外，

① 这篇论文最初曾以“经济史上的一个分析国家的框架”为题刊载于《经济史探索》（1979年7月）。

② 参见鲍莫尔（1962年）；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年）；唐斯（1957年）；尼斯卡宁（1971年）；布雷顿（1974年）。

③ 参见科斯（1937年）；阿尔切安和登塞茨（1972年）。

④ 参见诺思（1978年）。

需要提出的问题与日常政治决策程序不在同一水平上。对经济史学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解释逐渐由国家规定和强制实施的所有权的性质和解释强制实施的效力；最有趣的挑战，是解释结构的变革和所有权在这期间的实施。

第 二 节

开始，人们确实对准确界定国家是什么这一问题感到困惑。例如，中世纪庄园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归入从自发组织到国家这一连续整体之中？就其作用来说，国家是一种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它对纳税选民拥有的权力决定其地理疆域的延伸。所有权的实质是排他的权力。而一个享有行使暴力的比较利益的组织便处于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与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文献经常提到的理论相比，这里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离开了所有权便不能提出一种有用的国家的分析。^①总的说，对国家有两类解释，即契约理论和掠夺或剥削理论。关于国家的契约理论由来已久。契约理论近来再度受到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因为这些理论是交易原理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交易中，国家充当了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色。因为一项契约限制着每个人与他人有关的活动，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这样，契约理论方法便为促进使经济增长的有效的所有权的发展提供了一种解释^②。

形形色色的社会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按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和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则坚持掠夺或剥削的国

^① 在对国家起源的另一有趣的分析中，卡尼耶洛（1970年）未能将国家与所有权的建立联系起来。

^② 昂贝克的分析（现有的）是最认真的分析。

家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国家是一个集团阶级的代理机构;其职能是代表那个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榨取其他选民的收入。掠夺的国家将规定一套所有权使当权集团的岁入最大化,而不顾它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什么影响。

契约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可以潜在地提供一个节约利用资源的框架,从而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不过,作为每项契约的第三方和最终的强制根源,国家却在变成为争夺对其决策权的控制而进行战斗的场所。每一方都希望能对福利和收入进行再分配以有利于他们各自的团体。契约理论解释缔约的最初收益,而不是不同利益的选民后来使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掠夺理论则不考虑缔约的最初收益,而专注于操纵国家的那些人如何榨取选民的租税。不过,这两种理论并不是矛盾的,正是“暴力潜力”的分配使它们一致起来。契约理论假定暴力潜力在本主中间平等分配。掠夺理论假定不平等分配。

带来持续经济增长的所有权很少支配整个历史,但连最偶尔的对人类经验的观察都指明,曾有一些政治经济单位获得过长期的、巨大的经济增长。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我认为产量比人口增长得更快。这种现象不限于工业革命以来的这两百年。早在公元前八千年和公元后头两个世纪的罗马帝国的和平时期,财富便在农业发展中有过积累。在这些世纪中,整个文明确实衰落了甚至消失了,但也有一些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罗得斯,当然还有罗马共和国和帝国却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尽管工业革命的创造就是经济史学家所说的神话,然而,关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已没有什么新内容了。除了政治经济单位最终的经济衰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将在这一章提出一个简单的国家模型,以便解释对经济史说来是基本的两个方面:国家的普遍趋势是产生低效率的所有权,

从而不能达到持续增长；各国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导致经济变革，结果，最后引起经济衰退。首先，模型考察的是有一个统治者的国家。不过，我还要考察统治者和选民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导致统治者控制的削弱和政治上多元化的出现。关于合法性和转让搁到第五章去研究。^①

拥有一个使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的模型，有三个基本特点。一个特点说明统治者与选民的交易过程；其它两个特点说明决定交易费用的条件。

首先，国家用一组服务——我们可以称作保护和公正——来交换岁入。由于提供这些服务有规模经济，当有组织的专门从事这些服务时，所得到的社会总收入要高于社会上每个人保护其各自财产时所得到的社会总收入。

其次，国家试图象一个有识别力的垄断者那样行动，将每个选民团体分开，为每个选民团体发明所有权以最大限度增加国家的岁入。

第三，既然永远存在着能提供同一组服务的潜在的竞争对手，国家是受其选民的机会成本所制约的。竞争对手有其它国家，另外还有在现存的政治经济单位内可能成为统治者的个人。统治者垄断权力的大小是不同选民团体替代密度的函数。

如果更深入地考察这三个假设，我们不仅可以使模型的内容更充实，而且可以为经济史学家引出某些有益的含义。

第 三 节

国家所提供的基本服务，是一些根本性的竞赛规则。无论以

^① 在这一章我也不考察国家政策对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影响。